

## 日本人的朝鮮觀 ——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

羅麗馨\*

本文旨在探討神功皇后征三韓傳說的內容、衍化，及近現代日本政府如何利用此一傳說教育民眾，藉此觀察各時代日本人的朝鮮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是最早記載神功皇后傳說的二部書，其中充滿神異。日本學者從二書的編纂、取材、紀年等，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對皇后的存在，日本學界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異論，問題在於是何時的人物。有學者推斷是四世紀後半，但實際上仍未能有肯定的結論。至於皇后征三韓的事蹟，疑點亦甚多。日本學者亦從皇后的諡號、風土記、地方祭儀等各種角度作探討，說法不一。但可以推測，此一傳說大約是朝鮮問題、現實歷史、地方信仰三方面的結合。

元軍征日後，神功皇后的傳說增加更多新內容，對皇后的記載增加更多神秘性。尤其將異國人形容成狀如鬼神，將新羅王視為「犬」。這種蔑視朝鮮的心理，影響後世日本的朝鮮觀。近世日本一些思想家受儒學影響，強調禮的秩序，以致否定皇后的神怪傳說，認為視新羅為「犬」的傳說是附會，並試圖將此一傳說給予合理的、道德的再建構。但此對民眾影響不大，民眾社會經由節慶、戲劇流傳的皇后傳說內容，大致仍沿襲中世的模式。

近現代日本積極對外擴張，朝鮮是其遂行大陸政策的首要目標。日本政府透過歷史教學，將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視為是解釋日韓合併、日韓民族融合的最好教材。戰後，因學界的影響，此傳說被否定，並從學校教育中消失。但就一個民族的歷史傳承而言，神功皇后的各種傳說，似乎不可能這麼容易被忘掉。其真實性，在學界亦必就各學者的立場，而有各種不同的論說。

關鍵詞：朝鮮觀 神功皇后 三韓

---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神話、傳說很多是以口頭、歌謠，或某種特殊風俗制度等方式，在各地民間流傳。而在傳承的過程中，常會增加各種潤色，及各種新內容，神功皇后的傳說亦不例外。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編撰以前，一些與皇后有關的地名傳說，或皇后巡幸地方的故事等，已片斷在地方傳播，因此這些傳聞無疑的也是二書編寫皇后的材料。由二書所形成的皇后觀，以現代的思考觀點來看，確實有很多不合理、不可解的地方。但在創作的當時，則被當作是事實，而且在中世可以說完全被接受。近世及近代對皇后的看法雖有顯著的變化和差異，但島國的日本在夢想對外發展時，依然要利用此一日本歷史上頗受歡迎的人物。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至今仍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但其中潛藏著日本對韓國的優越意識，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以殖民和侵略為手段，對亞洲國家，尤其是朝鮮和中國，展開強硬的外交政策。當時，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被視為是日本在古代向海外發展並且使朝鮮臣服的先例。因此，此一傳說成為當時日本殖民朝鮮、滿州和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更且是併吞朝鮮的理論依據。二次大戰後，神功皇后的傳說雖然消聲匿跡，但對戰前出生的人而言，他們多相信《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完全是歷史事實的宣傳。因此，藉由對此一傳說的分析，大致可以理解各時代的日本人對朝鮮的看法。

日本學界對神功皇后的傳說，從《日本書紀》的古代紀年、夾注中的朝鮮和中國史料、皇后的宗譜和諡號、古代的日韓關係、考古發

掘、地方風俗等，多角度考察，肯定與否定二說互見，並無定論。<sup>1</sup>本論文目的不在究其真偽，而是希望從傳說的內容、衍化，以及對民眾的教育，觀察日本人的朝鮮觀。

## 二、《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的神功皇后

《古事記》(712年完成)和《日本書紀》(720年完成)是最早記載神功皇后事蹟的二部史書。《古事記》將神功皇后併入〈仲哀天皇〉，《日本書紀》第八卷是〈仲哀天皇〉，第九卷是〈神功皇后〉。二書每行字數不一，但大約均為三十個字左右。《古事記》〈仲哀天皇〉有五十六行，《日本書紀》〈仲哀天皇〉六十一行，〈神功皇后〉二百一十行。<sup>2</sup>可知神功皇后的記載，《日本書紀》較《古事記》詳細，內容更豐富。神功皇后的一生，據《日本書紀》載：皇后名氣長足姬，開化天皇曾孫氣長宿禰王之女，母葛城高賴媛。足仲彥天皇(仲哀天皇)二年(193)立為皇后，生譽田皇子(應神天皇)。辛巳年(201)群臣尊為皇太后，開始攝政。己丑年(269)四月，年一百歲，崩於稚櫻宮(奈良縣磯城郡)，葬於狹城盾列陵(奈良市山陵町)，追尊氣長足姬尊。《古事記》有神功皇后母系是新羅王子天日矛後裔的記載，此為《日本書紀》所無。又，皇后父系之記載亦較《日本書紀》詳細，同時記載氣長宿禰王是開化天皇的玄孫，而非曾孫。此外，《古事記》載，皇后生品陀和氣命(應神天皇)外，另生品夜和氣命。《日本書紀》則載譽屋別皇子(品夜和氣)

<sup>1</sup> 1970年代以後，少有人研究神功皇后的傳說，此或與1965年日韓恢復正常外交後，研究者面對與過去侵略朝鮮有關的歷史，均持謹慎態度有關。

<sup>2</sup> 參見田中卓，〈神功皇后をめぐる紀・記の所傳——特に神功皇后紀の成立について〉，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伊勢：皇學館大學出版部，1972)，頁402。

爲弟媛所生。又，《古事記》並沒有記載高麗臣服。另只記載皇后年一百歲崩，沒有提崩於那一年。兩書除皇后父系的世代和皇后所生的皇子記載不同外，內容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繁簡不同而已。共通點則可歸納下列三項，即(1)根據神的指示征討熊襲；(2)征討新羅；(3)平麿坂王和忍熊王之亂。<sup>3</sup>兩書有關皇后的記述大體相似，此大約與兩書均以《帝紀》爲主要材料有關。<sup>4</sup>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有關神功皇后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有

<sup>3</sup> 參見安萬侶奉敕撰，《古事記》，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7(東京：吉川弘文館，1937再版)，中卷，開化天皇，頁68-70；仲哀天皇，頁94、96、99；應神天皇，頁106-108。參見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1，卷8，仲哀天皇，頁233；卷9，神功皇后，頁241、248、264。皇后的宗譜，參見肥後和男，〈神功皇后の家系〉，收入氏著，《神功皇后》(東京：弘文堂，1957)，頁22-33；黑沢幸三，〈古代息長氏の系譜と伝承〉，《文學》，33(東京，1965)，頁17-31；三品彰英，〈天ノ日矛の伝説——神功皇后伝説考その一〉，收入三品彰英編，《日本書紀研究》，第3冊(東京：塙書房，1968)，頁9-29；横田健一，〈神功皇后の系譜について〉，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347-399；京口元吉，〈神功皇后紀の研究——三韓征伐物語の再検討〉，《日本歴史》，1：4(東京，1946)，頁2-5、11-13；水野佑，〈神功皇后論〉，《史觀》，76(東京，1967)，頁19-21。皇后陵，參見不著撰人，《延喜式》，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40，卷21，諸陵祭，頁548。皇后諱，參見長谷川福平，〈神功皇后御諱訓考〉，《史學雜誌》，15：9(東京，1904)，頁99-108。二王之亂，參見肥後和男，《神功皇后》，頁123-151；岡本堅次，《神功皇后》(東京：吉川弘文館，1959)，頁83-108。皇后之名，《古事記》記載為息長帶比売。麿坂王，《古事記》記載為香坂王。

<sup>4</sup> 《帝紀》記載歷代天皇、皇妃、皇子女、宮室、重大事件、崩年、山陵等，此書已不可考。《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在文體的使用、紀年、參考史料等不盡相同。參見津田左右吉，〈古事記及び日本書紀の新研究〉，收入氏著，《津田左右吉全集》，別卷第1(東京：岩波書店，1965)，頁240-242。

三點，即(1)由於征討新羅，高麗、百濟相繼臣服；(2)依神指示行事，顯示巫女的性格；(3)平羈坂王和忍熊王之亂，除去應神天皇繼承的障礙。三點中，則以第一點最為重要。皇后征討新羅的經過，綜合兩書之記載如下：仲哀天皇二年，熊襲國反叛不朝貢，天皇因此決定征討熊襲。八年(199)正月己亥至儺縣(今博多)，居於檀日宮(今香椎宮)。九月詔群臣議討熊襲，當時神託言皇后，謂：天皇不必擔憂熊襲不臣服，其空國耳，不足以舉兵爭伐。然西方有金銀寶國新羅，若征服新羅，熊襲自然降服。天皇乃登上高山遙望大海，但並未見此國。因此以為神在誘騙他，遂不信神言，仍強擊熊襲，結果失敗而還。九年(200)二月天皇崩於檀日宮，皇后和大臣武內宿禰秘不發喪，並將天皇遺體由海路運至穴門豐浦宮。三月，皇后遣吉備臣祖鴨別討平熊襲，並轉至山門縣誅土蜘蛛田油津媛。九月，召集諸國船隻，練兵甲，立大三輪社供俸刀矛。並派吾瓮海人烏摩呂和磯鹿海人名草，察看西方海上國家，占卜吉日。時皇后懷孕已臨產，但她將石頭挾於腰際，祈禱還軍之日再生產。十月，皇后以男裝親自指揮三軍，從對馬和珥津(鰐浦)出發。因大魚扶船、大風順吹，很快到達新羅。新羅王驚愕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距乎！」因此舉白旗投降，願從今以後為日本「飼部」(養馬)，每年納貢。皇后入其國，收其圖籍文書，並將矛立於新羅王門前。新羅王「波沙寐錦」以「微叱己智波珍干岐」為人質，並以八十艘滿載金、銀、綾、羅、縑船隻隨皇后凱歸，此後新羅王常以八十船貢於日本。高麗、百濟兩王聽說新羅投降，自知無法抵抗亦投降，並願「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皇后將兩國定為「內官家」(提供御料)，此即所謂三韓。<sup>5</sup>

<sup>5</sup> 參見《日本書紀》，卷 8，仲哀天皇，頁 233-237；卷 9，神功皇后，頁

此一神功皇后的記事是否為史實，近世以前幾乎沒有任何異論。雖然有些史書以《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二書所載為主體，並摻入一些地方的傳承，但大部分史書仍承襲此二書的說法。至近世，隨著史學思想勃興，國學者及受其影響的一些史家，開始考察神功皇后紀，但仍看不到有關二書的比較與分析，也未見對朝鮮史料有何批判。明治以後，受西洋史學研究風氣影響，史學界利用科學方法，對皇后紀開始進行分析、批判。尤其戰後，馬克思學派自由批判古代史，否定神功皇后的學者更多。<sup>6</sup>即主張神功皇后是為正當化「新羅臣服」而創造出來的人物，其事蹟亦是偽造的。

主張神功皇后記事是偽造的學者，提出各種疑點，大致歸納如下：地理方面，其一，軍隊登陸地點、行軍路線、戰鬥情形等，完全沒有記錄。雖記述軍隊直抵都城，但新羅都城慶州之名則未見。其二，新羅王發誓，即使「阿利那禮河逆流」，亦永不廢貢。依考據此河應是今天的漢江，當時是在百濟領內，660年新羅滅百濟後，始為新羅領有。因此可以推測，這是以後來的地理知識創造出來的。人物方面，其一，征討時，有諸神參加，卻不見從軍將士之名。其二，投降的新羅王，《日本書紀》記載是：「波沙寐錦」。此王應是新羅第五代王「婆娑尼師今」，<sup>7</sup>但此王是傳說時代的王，並非真實人物。其三，人質「微叱己智波珍干岐」一事，與《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實聖王元年(402)條之記載很相似，<sup>8</sup>但與神功皇后的時代不符，此應是《日本

241-248。《古事記》，中卷，仲哀天皇，頁94-96。「飼部」，《古事記》之記載為「御馬甘」。

<sup>6</sup> 參見吉井良隆，〈神功皇后研究史〉，《藝林》，10：4(京都，1959)，頁20。

<sup>7</sup> 朝鮮史學會編，《三國史記》，卷1(京城府：朝鮮史學會，1928)，〈新羅本紀一〉，頁8。

<sup>8</sup> 《三國史記》，卷3，〈新羅本紀三〉，頁3載：「(實聖尼師今)元年三月，與倭國通好，以奈勿王子末斯欣為質。」

書紀》的編者參考新羅的記錄，穿鑿附會所附加的。《古事記》並沒有新羅國王送人質的記載，似乎比較接近原來的傳說。年代方面，其一，神功皇后於仲哀天皇九年親征新羅，攝政六十九年崩。此年代恰好是耶馬台女王卑彌呼活躍的年代。<sup>9</sup>《日本書紀》引用《魏志·東夷傳·倭人》卑彌呼的記事，將神功皇后與卑彌呼置於同一時代，是明顯錯誤。因三世紀前半，大和朝廷是否已統一西日本仍是疑問，而且當時朝鮮半島上只有馬韓、辰韓、弁韓，百濟、新羅尚未成立。其二，將《日本書紀》中皇后攝政期間與百濟相關的記事，與《三國史記·百濟本紀》作比較，結果二書干支相同，但年代前者比後者提早一百二十年，如皇后攝政五十五年條載，「百濟肖古王薨」。此年西曆 255 年，干支乙亥。《三國史記·百濟本紀》則載，近肖古王死於 375 年，干支亦是乙亥。之後，百濟相繼即位的近仇首王、枕流王、辰斯王的薨年，及其他有關百濟的記事，二書干支雖同，但年代均相差一百二十年。<sup>10</sup>此應是《日本書紀》的編者，將《百濟記》、《百濟新撰》等朝鮮史料中有關日本的記事，當作皇后時代的事件處理之故。<sup>11</sup>此

<sup>9</sup> 卑彌呼大約在 190 年立為王，治世 50 年，248 年歿。

<sup>10</sup> 參見《日本書紀》，卷 9，神功皇后攝政五十五年(乙亥)、六十四年(甲申)、六十五年(乙酉)、應神天皇三年(壬辰)諸條，頁 263、264、271。《三國史記》，卷 24，〈百濟本紀二〉，近肖古王三十年，近仇首王十年，枕流王二年，頁 6、7；卷 25，〈百濟本紀三〉，辰斯王八年，頁 2。年代問題，另參見平田俊春，〈神功皇后紀と日本書紀の紀年——新妻說の批判〉，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 447-488。

<sup>11</sup> 《百濟記》、《百濟本記》、《百濟新撰》三書之編纂，有二說，1.百濟威德王朝廷所編。2.推古朝時百濟移民氏族在日本所編。其中以《百濟記》最重要。《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至雄略天皇引用《百濟記》，雄略至武烈天皇引用《百濟新撰》，繼体和欽明兩天皇引用《百濟本記》。金富軾，《三國史記》(1144)大約是根據《百濟記》編纂。參見李根雨，〈百濟記の主役〉，收入上田正昭編，《古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小

外，日本、天皇、三韓等用語，當時皆不存在。<sup>12</sup>

認為神功皇后傳說是偽造的學者，進一步提出傳說產生的背景、年代、史料運用等問題。關於傳說產生的背景，岡本堅次認為，四世紀後半至五世紀初，日本以任那(369-562，半島南部)作為根據地，和百濟相結壓迫新羅，新羅則與高句麗聯合對抗。這些日本和朝鮮的交涉，是傳說產生的基礎。神功皇后征伐新羅的傳說，雖與四、五世紀的歷史事實無關，但並非全然是虛構。傳說隨時代而變形，日本與新羅關係緊張，對傳說的變形影響很大。《日本書紀》中，特別提出新羅臣服，永遠朝貢的觀念，正顯示當時日本對新羅強烈的征服慾。<sup>13</sup>神功皇后傳說成立的年代，津田左右吉推測大約是在繼體朝(507-531)或欽明朝(539-571)。<sup>14</sup>直木孝次郎則認為，與六世紀以後，特別是推古天皇(593-628)以後的史實，有很深的關係，如仲哀天皇的死、新羅王的投降、應神天皇的誕生、神功皇后女帝的地位等傳說主體，是由齊明天皇的驟死、推古朝征討新羅、草壁皇子的誕生、推古以後女帝頻繁出現等事實，逐漸形成的。推古、齊明(655-661)、天智(662-671)三朝與新羅關係的困境，更促成此一傳說的成立。傳說的發展，持續至持統朝(687-696)。傳說大綱的成立，大約是七世紀以後。神功皇后則是以推古、齊明(皇極重新踐祚)、持統三女帝為對象塑造出來的人物。<sup>15</sup>水野佑認

---

學館，1991)，頁 330-331；三品彰英，〈百濟記、百濟新撰、百濟本記について〉，《朝鮮學報》，24(奈良，1962)，頁 1；池內宏，《日本上代史の一研究》(東京：近藤書店，1947)，頁 47-48。

<sup>12</sup> 參見岡部精一，〈神功皇后の三韓退治〉，《歷史地理》，朝鮮號(東京，出版年不詳)，頁 186-187。

<sup>13</sup> 參見岡本堅次，《神功皇后》，頁 55-82。

<sup>14</sup> 參見津田左右吉，〈新羅に関する物語〉，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1 卷，頁 109-110。

<sup>15</sup> 參見直木孝次郎，《日本古代の氏族と天皇》(東京：塙書房，1964)，頁

爲，由神功皇后諡號推測，傳說的成立大約是天武天皇(672-686)時代。而皇后征新羅的傳說，則是以白村江戰敗(663)爲契機構想出來的。<sup>16</sup>至於以朝鮮和中國史料論證神功皇后傳說真實性的學者，如津田左右吉由《日本書紀》中的一些地名和人名，認爲神功皇后的傳說，有些材料是取自百濟的記載。<sup>17</sup>平田俊春認爲，《日本書紀》於〈神功皇后紀〉中，使用《百濟記》、《魏志》、《晉起居注》等朝鮮和中國史料，主要是爲填補皇后一代六十九年的歷史。而將神功皇后另立一卷，則是爲記述當時的對外關係。<sup>18</sup>韓國學者李根雨更認爲，神功皇后紀中有八條記事，基本上是根據《百濟記》。而且與以往傳說式的記載完全不同，已出現詳細的人名和地名。其中百濟王之名和繼承順序，大體與《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一致。又由倭國人名用日本式和百濟式二種漢字借字法，也可以證明其中的記載是根據百濟史料。<sup>19</sup>岡本堅次認爲，〈神功皇后紀〉中，有三條引用《魏志》，一條引用《晉起居注》，從這些可以推知《日本書紀》編者將神功皇后視爲《魏志》

---

153-170。

<sup>16</sup> 參見水野佑，〈神功皇后論〉，頁 22-26。

<sup>17</sup> 津田左右吉，〈百濟に関する日本書紀の記載〉，收入氏著，《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2 卷，〈日本古典の研究〉下，頁 252-256。

<sup>18</sup> 參見平田俊春，〈神功皇后紀の成立と日本書紀の紀年〉，《日本古典の成立の研究》(東京：日本書院，1959)，頁 162-165。

<sup>19</sup> 參見李根雨，〈百濟記の主役〉，頁 332-333。另參見池內宏，《日本上代史の一研究》，頁 87-106；飯田瑞穂，〈上代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 29-31；京口元吉，〈神功皇后紀の研究——三韓征伐物語の再検討〉，頁 30-32；藤間生大，〈神功紀の編者〉，《文學》，27(東京，1959)，頁 508-509。韓國學者金錫享亦認爲神功皇后的傳說，完全是偽造。參見金錫享著、朝鮮史研究會譯，《古代朝日關係史》(東京：勁草書房，1973)，頁 391。

中的卑彌呼女王。<sup>20</sup>津田左右吉認為，神功皇后在位期間正是魏的時代，尤其六十六年條引《晉起居注》泰始二年(266)倭女王朝貢後，六十九年神功皇后即崩，此正顯示《日本書紀》編者將神功皇后比擬卑彌呼。<sup>21</sup>至於將皇后比擬卑彌呼的問題，関和彦認為，書紀編者為抹殺大和王權以前耶馬台國的存在，而將卑彌呼以女王的形式分離，使和神功皇后一致。書紀作者並非認為卑彌呼和神功皇后為同一人，而是用間接方式將其視為同一人，這是出於編者萬世一系的皇統思想。<sup>22</sup>較早提出〈神功皇后紀〉中引用《魏志》和《晉起居注》並非原注，而是後人附加的，是本居宣長(1730-1801)。和田博德和村上啓一則認為，這些注摻入原文中，大約是平安前期。<sup>23</sup>

在眾多學者由史料考察神功皇后傳說的真實性的同時，也有學者持不同的看法。如稻葉岩吉認為，神功皇后的外征，絕非突然發生，而是基於皇后及其左右臣僚對韓的認識。所謂三韓記事，應就三韓記事來看，將日本史實勉強與朝鮮史籍對照反而無益。有關戰爭的史

<sup>20</sup> 參見岡本堅次，《神功皇后》，頁 155-165。

<sup>21</sup> 參見津田左右吉，〈新羅に関する物語〉，頁 114。

<sup>22</sup> 參見関和彦，〈書紀編者の歴史観の一断面——神功紀分註魏志の検討を通して〉，《續日本紀研究》，152(大阪，1975)，頁 24-25。井上光貞和藤間生大也有神功皇后是被比擬為卑彌呼的看法，參見井上光貞，《日本國家の起源》(東京：岩波書社，1960)，頁 99；藤間生大，《埋もれた金印——日本國家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 30。

<sup>23</sup> 參見本居宣長，〈馭戎慨言〉，收入氏著，《本居宣長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初版3刷)，第8卷，頁 35-36；和田博德，〈神功皇后紀の倭女王注記について〉，《史學雜誌》，62：1(東京，1953)，頁 64-65；村上啓一，〈日本書紀編修に関する私見(一)——中國史籍との關聯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5(奈良，1951)，頁 21。另可參見伊野部重一郎，〈神后紀の注記とその紀年について〉，《日本上古史研究》，5：9(東京，1961)，頁 166-167。

實，往往只一方有記錄，如奈良時代的新羅海賊，朝鮮史籍完全沒有記載。反之，高麗末期的倭寇，日本史籍也僅記載一、二而已。這些是近古的事，更何況是上古時代。田中卓對〈神功皇后紀〉引用《魏志》和《晉起居注》，則支持原注的說法。小林行雄另從考古學提出旁證，認為〈神功紀〉和〈應神紀〉中豐富的日朝關係記事，沒有必要完全將其看作是後代所潤飾而加以否認。<sup>24</sup>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此神功皇后的傳說充滿神異。二書中，即使如神武天皇、日本武尊、應神天皇等傳說，亦無如此顯著的宗教色彩。<sup>25</sup>在現代雖仍有學者對此傳說持肯定的態度，<sup>26</sup>但其虛構性，大致已為日本學界所公認。

### 三、神功皇后傳說內容的衍化

元明天皇於和銅六年(713)五月，下令各國編纂風土記，這些風土記至今仍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有《出雲國風土記》，不完整的有《播磨風

<sup>24</sup> 參見稻葉岩吉，〈神功紀外征の新考察〉，《研究評論・歴史教育》，8：8（東京，1933），頁9；〈神功皇后の御外征〉，收入佐藤義亮編，《日本精神講座》（東京：新潮社，1935），10卷，頁101；田中卓，〈神功皇后をめぐる紀・記の所伝——特に神功皇后紀の成立について〉，頁431-435；小林行雄，〈神功、應神紀の時代〉，《朝鮮學報》，36（奈良，1965），頁25-46。

<sup>25</sup> 參見植村清二，〈神功皇后は果して架空の人物か〉，《日本歴史》，20（東京，1949），頁27。

<sup>26</sup> 肯定神功皇后傳說的學者，大正時代如和辻哲郎。參見和辻哲郎著，《日本古代文化》（東京：岩波書店，1925），頁76-81。昭和時代，如太田亮、橋本增吉、坂本太郎、三品彰英、植村清二、肥後和男等。參見所功，〈現代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研究文獻の要約〉，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120-123、126-127、134-136、138-140、149-152、167-169。

土記》，常陸、豐後、肥前三國的風土記是摘錄本。另外有《萬葉集抄》(鎌倉中期編纂)引用的《攝津國風土記》的逸文，《釋日本紀》(1274-1301成書)引用的《筑前國風土記》的逸文，及鎌倉時代以前的古籍所引用的逸文等約四十餘種。其中與神功皇后有關的記載，《播磨風土記》和《肥前國風土記》各三處。《釋日本紀》引用的逸文，《筑前國風土記》二處，《播磨風土記》和《筑紫風土記》各一處。《萬葉集抄》引用的逸文，《攝津國風土記》一處。<sup>27</sup>這些包括皇后征伐新羅、祀神、奉神意行事、地名等。如《播磨風土記》揖保郡宇須伎津條載：「大帶日賣命，將平韓國度行之時，御船宿於宇伎頭川之泊。」；飭磨郡因達里條載：「息長帶比賣命，欲平韓國渡座之時……」同書佚文載「息長帶日女命，欲平新羅國下坐之時，禱於眾神」。<sup>28</sup>《肥前國風土記》松浦郡郡名起源條、同郡逢鹿馭條、彼杵郡周賀鄉條，均載有「氣長足姬尊，欲征伐新羅。」<sup>29</sup>之語。《常陸風土記》行方郡田里條亦有：「息長足日賣皇后之時……三度遣於韓國。」之記載。<sup>30</sup>地名方面，《播磨風土記》記載，印南津是仲哀天皇與皇后平熊襲時，御船的停泊港。《肥前國風土記》記載，逢鹿馭是皇后征新羅時，在此地碰到鹿而得名；登望馭(駟馭)，則是皇后著男裝，於此摔落鞞而得名。<sup>31</sup>這些風土

27 參見井上秀雄，《古代日本人の外國觀》(東京：學生社，1991)，頁 42-43；梅田義彥，〈神功皇后の傳承地〉，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 527-531。

28 《播磨風土記》，收入與謝野寬、正宗敦夫等編纂校訂，《日本古典全集》〈古風土記集〉(東京：現代思潮社，1979，覆刻)，頁 44、23、100。

29 《肥前國風土記》，收入《日本古典全集》，頁 8 上、9 下、14 上。

30 《常陸風土記》，收入《日本古典全集》，頁 15 下-16 上。

31 《播磨風土記》，頁 7。《肥前國風土記》，頁 9 下、10 上。與皇后有關的各地地名來源及皇后東征沿途行事的傳說，參見貝原好古，《八幡宮本紀》，收入益軒會編，《益軒全集》5(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1911)，卷 1，仲哀天皇紀；卷 2，神功皇后紀上；卷 3，神功皇后紀下。梅田義

記，如《筑前國風土記》(732)可能以《日本書紀》為素材，但《播磨風土記》(715)和《常陸風土記》(718)均成書於《日本書紀》完成之前。由此可以推知，《日本書紀》編纂之前，不少地方已將皇后和朝鮮的關係連結在一起。

奈良時代，不少史料有皇后和朝鮮問題相關聯的記載，如日本與新羅之間，自 732 年以後，因新羅常不守朝貢禮節，雙方關係緊張。《續日本紀》中即多次記載，天皇遣使至奉祀皇后的香椎宮祈願。如天平九年(737)四月，聖武天皇派遣勅使至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二社，及香椎宮奉幣，「告新羅無禮之狀」。天平寶字三年(759)八月，淳仁天皇派遣大宰帥至香椎廟，「奏應伐新羅之狀」。天平勝寶四年(752)六月，孝謙天皇在朝堂宴饗新羅使節時，詔書中仍言，新羅迄今仍向日本朝貢，為日本屏藩，「始自氣長足媛皇太后平定彼國」。<sup>32</sup>《釋日本紀》則記載，日本有假名雖始於應神天皇遣使至新羅，招來文人、學習文字，但卻是皇后征三韓帶來的成果。<sup>33</sup>又如與百濟的關係，也常提到皇后。如《續日本紀》和《類聚三代格》均有，神功皇后攝政時，百濟肖古王開始向日本朝貢，百濟王遠慕皇化，「輸款久矣」等記載。<sup>34</sup>《懷風藻》則記載，日本文風漸盛，是由於神功

---

彥，〈神功皇后の傳承地〉，頁 542。

<sup>32</sup> 菅原真道編，《續日本紀》，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2，卷 12，聖武天皇，頁 143；卷 18，孝謙天皇，頁 214-215；卷 22，淳仁天皇，頁 265。香椎宮即香稚宮，日本史料兩者都使用。奈良至平安時代被當作廟，約於圓融天皇時代(969-983)成為神社。參見高階成章，〈神功皇后紀の成立過程〉，《國學院雜誌》，48：9(東京，1942)，頁 17-18。

<sup>33</sup> 大常卿下部朝兼永撰，《釋日本紀》，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8，卷 1，開題，頁 5。

<sup>34</sup> 《續日本紀》，卷 40，桓武天皇，頁 546。不著撰人，《類聚三代格》，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卷 17，躡免事，頁 516。

皇后征伐半島，百濟入朝。<sup>35</sup>此外，甚至有史料直接將皇后稱為十五代天皇。如《住吉大社神代記》(731)中有：

氣息長姬天皇，諱神功，天皇第十五代，初居橿日宮，後磐余稚櫻宮，在大和國十市郡磐余里。<sup>36</sup>

《日本書紀》將皇后作紀，但有別於天皇。而《日本紀》、《攝津國風土記》、《常陸國風土記》等，雖均出現過稱皇后為天皇之例，但明確將其列為十五代天皇，則始於此書。其後，平安、鎌倉時代，雖有如《釋日本紀》不承認皇后為女帝的文獻，但幾乎所有的史書均踏襲女帝說。《大日本史》(1657-1906)編纂時，始不再將神功皇后列入帝紀，而改入皇妃傳。但至幕末，仍有主張女帝說的學者。<sup>37</sup>

平安時代，將皇后和新羅問題連結的情況，並沒有太大變化。此時期，神功皇后還有航海、軍事、守護國家，及護持皇位等功能。<sup>38</sup>飯

<sup>35</sup> 參見杉本行夫注釋，《懷風藻》(東京：弘文堂書房，1943)，序，頁1。

<sup>36</sup> 田忠卓編，《住吉大社神代記》(大阪：住吉大社神代記刊行會，1951)，照相原文頁16。《住吉大社神代記》的作者，為住吉神社的祠官家津守宿彌氏一族。完成的年代，有多種說法，如田中卓認為是延曆八年(789)，坂本太郎認為是元慶三年(879)，西宮一民認為是天曆至長保年間(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前田晴人認為，諸說並存是因為此文書舊傳說和新潤色混雜，部分的古傳說則有可能上溯至天智朝或天智朝以前。參見前田晴人，《神功皇后傳説の誕生》(東京：大和書房，1998)，頁98-99。

<sup>37</sup> 參見吉井良隆，〈神功皇后研究史〉，頁29-30。以栗山潛峯為開端，經本居宣長的研究，重野安繹、津田左右吉的考覈，得到的結論是，《日本書紀》中的神功皇后紀，是仿《漢書》中的呂后本紀而作。參見同文，頁30-34、38-45。另參見吉井良隆，〈近世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86-98。

<sup>38</sup> 參見藤原良房，《續日本後紀》(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卷1，天長十年(833)四月壬戌條，頁176；卷5，承和三年(836)五月庚申條，頁221；卷13，承和十年(843)十月癸酉條，頁344；藤原冬嗣，《日本後紀》(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卷20，弘仁元年(810)十二月壬午條，頁110。

田瑞穗認為，這一時期對神功皇后的理解增加這些新要素，不是日本對外關係趨於消極，而是對皇后的關心減低。<sup>39</sup>

神功皇后的傳聞，以蒙古侵襲日本為轉變契機，此後增加更多新內容。蒙古入侵前，對皇后較少關心，如《扶桑略記》(1094 年以後)、《簾中抄》(十二世紀)、《愚管抄》(1220)等，對皇后的敘述簡潔單調。<sup>40</sup>但當蒙古招諭日本，日本朝野受此衝擊，在興起強烈敵愾心的同時，神功皇后再度受到關注。從文永五年(1268)到弘安四年(1281)，朝廷多次派遣山陵使，至神功皇后、天智、宇多、後三条、後白河、後鳥羽、土御門、後嵯峨等八天皇的御陵，獻御書，祈求國家平安、退敵，其中神功皇后陵則列為八陵之首。京都正傳寺禪僧東巖慧安(1225-1277)於文永八年(1271)九月在石清水八幡宮祈願，願文中有：

昔在女帝，名曰神功，懷胎母人，相當產月，為防他州無量怨敵，誓心決定，起勇猛心。因之，國中一切神祇知其志念，皆悉隨從。擲於干珠，大海枯竭；擲於滿珠，海水盈滿。無數怨敵，漂沈無餘。……<sup>41</sup>

可知，在國家遭遇危機時，又開始回顧皇后的功績。中世有不少史書有神功皇后的記事，如《八幡宇佐宮御託宣集》，此書為宇佐八幡宮社僧神咩所著，完成於 1290-1313 年之間，書中有很多關於皇后的傳說。<sup>42</sup>當中雖很多是受蒙古入侵刺激被修飾過的傳聞，但傳說的

39 參見飯田瑞穗，〈上代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頁 46。

40 參見久保田收，〈中世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 49-57。

41 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東京：東京堂，1971-1989)，14 卷，10558 條，東巖慧安願文案，頁 112。

42 重松明久校注訓譯，《八幡宇佐宮御託宣集》(東京：現代思潮社，1986)，卷 15，〈異國降伏の事〉上，頁 429-452；卷 16 〈異國降伏の事〉下，頁 453-480。

核心大約是當地自古以來就有的記憶。另外，《八幡愚童記》(八幡愚童訓)也有神功皇后外征的詳細記載。此書完成於鎌倉時代後期(1301-1304)，<sup>43</sup>作者是石清水八幡宮的祠官，他希望藉此書強調八幡神的靈驗，得到幕府的恩賞。此書〈降伏事〉中，關於皇后的記載，加入更多新內容，如高良明神、海神安曇磯良、從龍宮取得旱珠和滿珠等。此書與《日本書紀》不同的地方，大約有四點：1、仲哀天皇時，有「形如鬼神，身色赤，頭八，乘黑雲，飛虛空」叫塵輪者，由異國來攻擊日本，天皇和皇后率領五萬軍兵至長門國豐浦郡，雖射殺塵輪，但天皇中流矢而死，並遺言皇后要征討異國。即神功皇后的出兵是為復讐，並不是為取得金銀財寶。由異國入侵的塵輪，狀如鬼神。2、征討經過，如「異賊」軍容是船十萬八千艘，四十九萬六千餘人。皇后以高良明神為使者去宣戰，但高麗國王、大臣、人民等，大大嘲弄皇后。皇后則以旱珠投海，大海立刻變成陸地，異國軍兵很高興的下船攻擊日本船。但瞬間皇后又投入滿珠，結果海水暴漲，滅亡三韓。即皇后使用旱珠和滿珠打敗異國；與皇后相戰的是高麗而非新羅。3、異國投降後，皇后以弓弭在大磐石上書寫「新羅國大王，日本國之犬也」。異國則約定今後「成日本之犬，備奉年貢事。」即皇后將新羅王視為「犬」。4、敘述之最後，有「我國之為我國，皇后之皇恩也。」之語，盛贊皇后之德。<sup>44</sup>此書對皇后的記載，充滿神怪，尤其將外敵視為「鬼」和「犬」，此與中世日本的領域觀和神國觀有關。所謂領

<sup>43</sup> 參見萩原龍夫校注，《八幡愚童記》乙，收入櫻井德太郎、萩原龍夫、宮田登編，《日本思想大系》，20(東京：岩波書店，1975)，《寺社緣起》，解說文，頁 207。久保田收認為是花園天皇時代成書，即延慶元年(1308)至文保二年(1317)。參見久保田收，〈中世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頁 70。

<sup>44</sup>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收入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神道大系》(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1992)，上上，〈降伏事〉，頁 113-124。

域觀，即將國家領域的中心視爲淨，領域的周邊視爲穢，境界和境外的異域是充滿穢的空間。境外的住民，則被看作是恐怖的鬼。高麗是異域，住在高麗的人當然是鬼。所謂神國觀，即日本是神國，而且是位居世界中央的大國。此一神聖的國土觀，遂產生對外優越意識。如將蒙古視爲夷狄、爲犬的子孫。高麗協助蒙古入侵日本，日本怨恨高麗，因此將高麗等同蒙古，亦以夷、犬視之。<sup>45</sup>此種視朝鮮半島國家爲牲畜的蔑視心理，影響後世日本人的朝鮮觀。

中世的民衆因蒙古的侵襲而憶起神功皇后及其恩德，將皇后的傳說附加更多新內容。久保田收認爲，《八幡宇佐宮御託宣集》中附加很多神功皇后的傳說，而《八幡愚童記》則是以這些傳說爲本，進一步加以統合。此後，很多關於皇后的傳說，都受此二書的影響。如《宗像大菩薩御緣記》(鎌倉末或 1336-)、《高良玉垂宮緣起》(與前書約同時)、《諏訪六明神緣起》(十四世紀前半)、《水鏡》(鎌倉末)、《太平記》(1371)等，各書雖附加一、二新說，但傳說大綱與上二書並無太大差異。即使唯一的皇后傳記《神功皇后緣起》(1433)，其內容與上述諸書仍大致

<sup>45</sup> 領域觀：參見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頁 109-112、頁 114-115。古代日本的對外關係，並沒有將「境界外」視爲鬼，將其視爲鬼，是平安中期。鬼怪奇談出現於九至十世紀。參見伊藤喜良，《日本中世の王權と權威》(京都：思文閣，1993)，頁 132。神國觀：參見《鎌倉遺文》，第 3 卷，頁 193 下，1485 條，元久元年十月十七日沙門貞慶咒願文；第 14 卷，頁 300，10872 條，文永八年九月十二日日蓮書狀；第 15 卷，頁 377 上，11837 條，文永十二年二月日蓮書狀；釋光宗，《溪嵐拾葉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續諸宗部七第 76 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1973)，第 6 卷，頁 518 下；慈遍，《舊事本紀玄義》，收入續群書類從完成會編，《續群書類從》，第一神祇部(東京：平文社，1970)，卷 5，頁 155 上；後藤丹治、釜田喜三郎校注，《太平記》(東京：岩波書店，1960-1962)，卷 39，神功皇后攻新羅給事，頁 457。

相同。<sup>46</sup>至於《神皇正統記》(1337)則是以《日本書紀》為主，混雜作者北畠親房的感想，此書特別稱頌皇后的出兵、日本和半島交通、輸入文化促使日本繁榮等。<sup>47</sup>

神功皇后傳說再度被頌揚是豐臣秀吉(1536-1598)征朝鮮時，秀吉入侵朝鮮有很多與皇后相關的記載，如隨鍋島直茂(1538-1618)從軍的家臣田尻鑑種的《高麗日記》、松浦鎮信(1549-1614)家臣吉野甚五左衛門的《吉野日記》、加藤清正(1562-1611)家臣下川兵大夫的《清正高麗陣覺書》等，都有皇后征三韓的敘述，且認為三韓入貢是先例。<sup>48</sup>宗義智(1568-1615)的軍隊打敗朝鮮軍入忠州時，吉川広家(1561-1625)的從軍禪僧宿蘆俊岳，想起神功皇后在忠州的足跡，其《宿蘆稿》中留下稱贊皇后的詩文：

昔時，神功皇后欲治異國，異國忽乞降，皇后聽焉。自忠州而歸本朝，直以弓劃石曰：唐土王者日本犬也。至今膾炙世俗之人口矣。又今軍旅于忠州，而追憶往事矣。皇后所劃之石，今安在哉矣。詩曰：神功無處不聲名，昔到此州俱決爭。皇后一從留記後，點頭頑石是吾兵。<sup>49</sup>

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可以說深入從軍武士、僧侶心中。這些秀吉軍隊中隨處可見的神功皇后傳聞，基本上是沿襲《八幡愚童記》的記載。至於秀吉本身出征前，他在奉祀神功皇后的伏見(今京都市伏見區)御

46 參見久保田收，〈中世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觀〉，頁 72-83。

47 參見北畠親房，《神皇正統記》，收入於三枝博音、清水幾太郎編，《日本哲學思想全書》(東京：平凡社，1979)，第 3 卷，イデオロギー一篇，卷 2，第七代孝靈天皇，頁 43-44；第十五代神功皇后，頁 49-50。

48 參見北島万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58-59。

49 參見宿蘆俊岳，《宿蘆稿》，收入塙保己一原編、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9)，13 輯下，卷 356，頁 1003 下。

香宮舉行出征儀式；<sup>50</sup>在與西笑承兌(1548-1608)等前往肥前名護屋(在今佐賀縣)途中，特別參詣長門國府的仲哀天皇和皇后的社祠(下関忌宮神社)；右筆(書記官)山中橘內則向秀吉獻上《神功皇后異國退治緣起》。<sup>51</sup>秀吉之所以崇敬皇后，除期待皇后護持外，應是亦希冀藉此強化他用兵的正當性。

德川家光(1604-1651)以後，幕府強調禮的秩序，不再用武威之語，<sup>52</sup>神功皇后傳說的內容，也發生變化。以朱子大義名份為基礎編纂的《大日本史》，對新羅的記載，主要根據《日本書紀》。其注中有：

按八幡愚童訓、太平記曰：皇后以弓弮畫石上曰：新羅王日本犬。按皇后征新羅，非問罪之師，止降服朝貢耳，不應辱國王如此已甚，二書所載，未知何據，蓋以上世有火酢芹命苗裔諸隼人等，代吠狗而奉事之說，附會為此說耳。<sup>53</sup>

即否定《八幡愚童訓》和《太平記》二書視新羅為「犬」的傳說。認為皇后出兵的目的，在使新羅投降朝貢而已，不至於如此侮辱外國國王，此應是附會。又，貝原好古(1664-1700)在其《八幡宮本紀》一書中，對《八幡愚童記》的記載，亦一一加以否定。如由異國入侵的「塵輪」，有八頭，形如鬼，乘黑雲等，認為「此事違日本紀之本說」，且「妄誕不經，不足論」。操縱潮汐的旱珠和滿珠傳說，是「大謬也」、

<sup>50</sup> 參見貝原好古，《八幡宮本紀》，卷3，頁712上-713上。

<sup>51</sup> 參見北島万次，《豐臣政權の對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1990)，頁143；北島万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頁60；金光哲，《中近世における朝鮮觀の創出》(東京：校倉書房，1999)，頁195。

<sup>52</sup> 日本型華夷意識以武威為基礎，與中國以德為主的華夷意識不同。參見塚本明，〈神功皇后傳説と近世日本の朝鮮觀〉，《史林》，79：6(京都，1994)，頁11。

<sup>53</sup> 德川光圀修、德川綱条校、德川治保重校，《大日本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9)，卷232，諸蕃1，新羅上，頁248。

「甚偽說」。於石上刻「新羅國王日本犬」的傳說，是附會等。與《大日本史》一樣，將神功皇后的傳說，回復到《日本書紀》的記載。但貝原好古對神功皇后出兵的動機，卻例外的沒有採納《日本書紀》所載是爲了金銀財寶。他認爲皇后征討新羅是爲仲哀天皇「復仇」，是「義兵」，否則「喪中舉兵，征人之國，非君子之道」、「以土地之故，伐無罪者之國，是謂貪兵」。新羅投降後，有家臣建言殺其王，皇后以出兵之前，神示「勿殺自服」爲由，未殺新羅王。貝原好古從「信」、「義」的觀點，對皇后有很高的評價。他認爲「凡聖王賢君發兵，使不服之國服之。爲懲有罪，不得已用之，不以小事殺人。」<sup>54</sup>塚本明認爲，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思想家們試圖對神功皇后的傳說給予合理的、道德的再建構，但此並非爲消除對朝鮮的蔑視，而是認爲朝鮮道德低劣，應該順服。<sup>55</sup>

十八世紀因簡化接待朝鮮通信使問題、海防問題、國學興盛等，神功皇后仍時被提起。如新井白石(1657-1725)於《殊號事略》中，有神功皇后征服新羅後，至齊明天皇二十四代，四百四十七年間(四百四十五年之誤)，三韓都是日本的藩屬國等語。<sup>56</sup>林子平(1738-1793)於《三國通覽圖說》(1785)和《海國兵談》(1786)中，均有神功皇后征伐以後，三韓臣服，及其代代向日本貢獻調庸等記載。<sup>57</sup>中井竹山(1730-1804)於《草茅

54 貝原好古，《八幡宮本紀》，卷 1，頁 639 上下；卷 2，頁 660 下、661 上下夾注、663 上下。

55 參見塚本明，〈神功皇后伝説と近世日本の朝鮮観〉，頁 14。

56 新井白石，〈殊號事略〉，收入今泉定介編，《新井白石全集》，第 3 卷（東京：吉川半七，1906），頁 622 下。

57 林子平，《三國通覽圖說》，收入山本鏡編校，《林子平全集》，第 2 卷（東京：生活社，1944），頁 237；林子平，《海國兵談》，收入《林子平全集》第 1 卷，卷 16，頁 349。

危言》，亦有神功皇后遠征之後，韓國朝貢臣服，歷久不絕等語。<sup>58</sup>這些都說明「神功皇后征服三韓，朝鮮自古即是日本的朝貢國」之思維並未改變。

神功皇后的傳說，在近世民眾之間也廣泛流傳。傳說的內容則大致沿襲中世的模式，如京都的祇園祭，船舩裝飾的鬼有角有牙，此鬼即是三韓。投降的鬼(朝鮮人)，捧著獻物的故事，年年在此一年當中最的祭典中出現。<sup>59</sup>皇后降服三韓的傳說，也成為當時戲劇的題材。1791年上演的淨琉璃「神功皇后三韓責」，有關皇后出征的動機、不殺主義、以神國自視等，是承襲《日本書紀》。但對投降的新羅王，則在岩石上刻「三韓王日本之犬」，作為「至末世末代」為日本之「奴」的證據，這部分很明顯的是中世的傳說。<sup>60</sup>1748年出版的《朝鮮來朝記》，卷首亦有神功皇后征三韓，其將領武內宿弥在凱旋之日，於海邊聳立的岩石上書寫：「日本之犬」；「是後，世世入貢我朝」等記載。<sup>61</sup>即將朝鮮通信使視為與「三韓獻貢物」一樣，是朝貢使節。又如浮世繪畫家羽川藤永的「朝鮮人來朝圖」(約1748年，收藏於神戶市立博物館)、奧村政信(1686-1764)的「朝鮮人來朝圖」(收藏於上野博物館)、喜多川歌磨(1753-1806)的「朝鮮人來朝行列圖」(1811年，長門市岡藤家藏)等，由畫題可知大約亦是此一思想的反映。中世各種皇后的傳說，至近世經由節慶、戲劇、信使行列記、繪畫等，亦深入民眾腦海。當時雖有

58 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寬政元年[1789]序，出版者不明)，〈朝鮮之事〉，頁53下。

59 參見塚本明，〈神功皇后伝説と近世日本の朝鮮観〉，頁15-21。

60 參見紀海音，〈神功皇后三韓責〉，收入海音研究會編，《紀海音全集》，第5卷(大阪：清文堂，1978)，頁62-63。

61 參見松田甲，〈李朝英祖時代戊辰信使の一行〉，收入松田甲，《日鮮史話》，第4編(東京：原書房，1976)，頁64。《朝鮮來朝記》一書，編者不明，為松田甲個人收藏。

儒學者從道德角度重新解釋此一傳說，但對民眾並沒有太大影響。

#### 四、神功皇后傳說與歷史教育

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本併吞韓國。在此前後，日本的小學或國定教科書中，頌揚神功皇后征三韓的教育已很盛行，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結束。就大正九年(1920)十一月出版的「尋常小學國史」上卷而言，此教科書將皇后特別編成一章。其內容可以說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二書的精簡整理，記述的重點仍是親征三韓。<sup>62</sup>此教科書雖是日本併吞韓國以後才出版，但之前的教科書與此內容大同小異。在教師專用手冊中，「本課主旨」有：「使學生知由於神功皇后征韓，皇威遠播海外；叛服無常的熊襲，永遠不定；朝鮮、中國的文物陸續傳入我國，對我國文明有很大裨益；朝鮮和我國關係深厚；今天，則我國文物傳入半島，尤其要使學生知道我國進步的顯著。」<sup>63</sup>等語。即特別強調「征韓」的意義。又，《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記載的新羅是金銀之國，皇后征討新羅的結果是得到戰利品和年年貢調的約定，即皇后使用武力的原因是物質慾望。但據此直接教授學生，則有傷皇后的威德，對併吞韓國的統治者而言也不適合。為配合明治(1867-1911)、大正(1912-1925)時代對半島的政策，併吞韓國一事必須有合理說明。因此教師手冊又有「半島上小國並立，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其影響立刻及於我國。由於皇后誠意希望和平，所以發兵征韓。」結果「我領土得到平安，雙方亦皆得增進幸福」；「因有古代皇后征韓，三韓臣服的事實」，「現今朝鮮已成爲我國的一部分，人民沐浴

<sup>62</sup> 參見文部省，《尋常小學國史》(東京：日本書籍株式會社，1987 複刻本)，上卷，頁 15-19。

<sup>63</sup> 參見岡本堅次，《神功皇后》，頁 5-6。

皇化」，「使學生知此(併韓)絕非偶然」手冊最後還有「奉仰皇后德威的同時，要讓學生知道當時國民的武勇，及為國家的盡力。」<sup>64</sup>等語。即強調朝鮮半島動搖，將會威脅日本。此種藉由誠意希望和平到不得已行使武力的觀念，是與明治以來的大陸政策相結合的思想。

其實，在日本併吞韓國前一年(1909)十月發行的國定教科書，不稱朝鮮而稱韓國；沒有皇后男裝的記事；新羅王「東有神國謂日本」之語亦未見。<sup>65</sup>所以可以說，愈到後來，皇后親征的傳說愈盛，國體觀念更被強調。岡本堅次認為，對接受戰後教育的年輕人而言，或許很難理解。但他們那一輩的人，從兒童時代反覆接受這樣的教導，無可否認的，「三韓征伐」確實是培養帝國主義思想最好的教材。<sup>66</sup>

日本於 1931 年發動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小學如何教授此課文，下面以滋賀縣師範學校的訓導村瀨仁市於 1932 年在《研究評論·歷史教育》發表的教案作重點說明。1、授課目的：使學生瞭解神功皇后興師征伐新羅，是繼承仲哀天皇遺志，為根絕禍亂。此不僅使國內安寧，亦發揚皇威於海外；使學生在欽仰皇后雄圖之同時，亦明瞭此後由半島輸入學問、技術，對日本文化的開展有很大裨益；同時也使學生領悟朝鮮和日本關係的深厚，及三韓臣服的歷史意義。2、教材重點：(1)神功皇后是日本第一位向海外發展，使外國臣服的皇后。(2)仲哀天皇征伐新羅的計畫，不是侵略的遠征。皇后繼承仲哀天皇遺志，是為保護日本在半島上的優越權，是正義的出兵，非掠奪他

<sup>64</sup> 參見岡本堅次，《神功皇后》，頁 7-8。

<sup>65</sup> 參見文部省，《尋常小學日本歷史》(大阪：修文館，1987 複刻本)，卷 1，頁 10-13。朝鮮於 1897 年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因此至 1910 年仍使用「韓國」稱號，其他時期(包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均使用「朝鮮」稱號。參見不破哲三，《歷史教科書與日本的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 13。

<sup>66</sup> 參見岡本堅次，《神功皇后》，頁 8。

國。這次的滿蒙事變與此相同。(3)爲了日本國內的和平、半島的和平，以至東亞和世界的和平，日韓合併是日本精神的表露。皇后對外征伐，是日韓合併的第一步。本課文在確立日韓民族共存共榮的自覺上，有重要的使命。(4)皇后識見卓越，不費一箭使彼臣服，發揚國威。皇后的壯舉是日本文化躍進的新紀元。3、教授事項：(1)征伐三韓絕無侵略之意。強調外征是要收回過去日本在半島上的優越權，是爲了解決外交問題和國內和平。與滿洲事變一樣，都是爲了正義的皇師。(2)本課文不僅考察上古的鄉土文化，且由皇后的宗譜，使學生更景仰皇后的偉德。(3)作爲日鮮民族融合的教材，有其意義。<sup>67</sup>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出版的《初等科國史》，有關皇后的記述基本上亦相同。文末則有「欽慕日本優越的國體，從半島渡來的人逐漸增多。因此，國內安定，皇威及於半島，此全是諸神護佑和皇室的恩德。」<sup>68</sup>等語。此時，正值戰爭末期，戰況失利，大約爲鼓舞國人的信心，因此特別強調日本是神國和天皇的恩德。

由上所學之教科書和教案，知近現代日本爲合理化其對外擴張的野心，並對國民根植國體觀和進出大陸的信心，在歷史教學中特別強調其史上第一位向海外發展的神功皇后，極力說明其征伐朝鮮半島的正當性。尤其將皇后出兵半島，看作是日韓合併的第一步，將此視爲解說日韓民族融合的最好教材。

1945年8月14日大戰結束，盟軍總部於10月22日、30日，12月15日、31日，四次向日本政府發佈與教育相關的指令。對教育的管理政策，主要是禁止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取消軍事教育科目

<sup>67</sup> 參見村瀨仁市，〈神功皇后の章取扱實際案〉，《研究評論・歷史教育》，7：1(東京，1932)，頁81、84-85。

<sup>68</sup> 參見文部省，《初等科國史》(大阪：大阪書籍株式會社，1987複刻本)，頁22。

和軍事訓練。12月31日的指令是，停止「修身、日本歷史和地理」的授課。<sup>69</sup>由於文部省編輯的《暫定初等科國史》上、下二卷不符指示，盟軍總部乃召集一些日本史學者重新編寫，並於1946年9月出版小學用歷史教科書《くにのあゆみ》(國家的腳步)上、下二卷，包括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四部份，分別由家永三郎、森末義彰、岡田章雄、大久保利謙等四人執筆。古代部分以考古學代替神話，即用科學、客觀、合理的方法撰寫古代史。中學歷史教科書《日本の歴史》，亦同時出版，作者為関晃、森末義彰、伊東多三郎、小西四郎等四人。<sup>70</sup>由於新歷史教科書的完成，同年10月14日盟軍總部允許日本再講授日本歷史課程。文部省亦制訂「國史授業指導要項」，其中則有「神話傳說是表現古代民族的理想，對後世有不少影響。但神話、傳說畢竟是神話、傳說，不能與歷史事實混淆，因此教科書不記載。」<sup>71</sup>等語。所以在盟軍指令下，新編輯的歷史教科書已完全排除神話和神功皇后征三韓的教材。

1956年12月，日本加入聯合國，重返國際社會。由於國際視野擴大、經濟逐步成長、歷史學相關的各科學發達、日本史學者的反省、國民的自覺等，日本希望再建日本自己的教育。1958年全面修訂中、小學課程，基本上是希望將《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的神話、傳說列入課程中。根據調查，1966年以後，社會科和日本史的教科書中，有日本神話記述的，六種小學教科書中三種有(1968年增至五種)，九種中學教科書全有，二十種高中教科書中十五種有。但這些教科書，全

<sup>69</sup> 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頁277-280。

<sup>70</sup> 參見家永三郎等，《くにのあゆみ》(東京：日本書籍株式會社，1987 複刻本)，頁1-5；張海鵬、步平主編，《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頁32-33。

<sup>71</sup> 山口康助，〈神功皇后と歴史教育〉，收入神功皇后論文集刊行會編，《神功皇后》，頁692。

部都沒有關於神功皇后的記述。只有大和朝廷在四世紀末向朝鮮半島伸展勢力，或支配半島南部的國家等，類此記載。山口康助認為，這是戰敗即所謂被佔領史觀所殘留的影響。戰後限制日本歷史教育方向和內容的最大力量，是盟軍的指令。盟軍撤退後，此影響得以繼續存在，則是因左翼史學家及其同調知識份子的支持。<sup>72</sup>

日本近現代約百餘年史學的特徵是，一方面繼承近世的傳統，另一方面接受西洋學風，逐漸確立實證主義的研究風格。關於神功皇后征新羅的傳說，一些學者亦予以科學的批判。明治時代的特色是，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大體相信，問題點只是其年代和表現，與朝鮮史書及其他日本史書的記事是否相符。大正時代，歷史學者對神功皇后紀的批判更嚴厲。如原勝郎、池內宏、津田左右吉除繼承明治中期展開的紀年論爭外，更進一步分析、批判兩書的內容。原勝郎試圖再建構紀年，池內和津田兩人更且認為其非歷史事實。昭和一〇年代(1935-1944)，對神功皇后質疑的學者，重點在皇后紀中部份記事的意義。但這些研究成果，在二次大戰前，並沒有反映到中、小學的學校教育上。由於對外擴張的野心，反而極力強調皇后的功績和威德。戰後，尤其昭和三〇年代(1955-1964)以後，著名的古代史學者大都否定此一傳說。<sup>73</sup>受此影響，神功皇后也從學校教育中消失。惟就一個民族的歷史傳承而言，神功皇后的各種傳說，似乎不可能這麼容易被忘記。其真實性，在學界亦必就各學者的立場，而有各種不同的論說。

---

<sup>72</sup> 參見〈神功皇后と歴史教育〉，頁 695-700。

<sup>73</sup> 參見所功，〈現代における神功皇后観——研究文献の要約〉，頁 103-182。戰後，神功皇后的研究，質與量均遠超過戰前，但尚未解決及爭論的問題仍然很多。

## 五、結語

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古事記》記載簡略，《日本書紀》則豐富生動。日本學者從二書的編纂、取材、紀年，及傳說的內容、形成等，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對皇后的存在，日本學界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異論，問題在於是何時的人物。有學者推斷是四世紀後半，但仍未能有肯定的結論。至於皇后征三韓的事蹟，疑點亦甚多。傳說的成立，通常有其歷史、社會背景。《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的此一神功皇后傳說，形成於何時，如何構成等，日本學者亦從皇后的諡號、風土記等各種角度作探討。由於皇后的諡號與舒明、皇極兩天皇的諡號相似，因此有學者認為，神功皇后傳說的出現，與六世紀至七世紀前半，陸續出現女帝有關。又，由於《常陸國風土記》及九州諸國風土記等，均出現有與神功皇后相關的傳說，因此有些學者則據此推測神功皇后的傳說，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編纂當時已存在，且已普遍流傳於民間。至於神功皇后傳說的構成，則與地方傳說、地方祭儀、氏族傳承、各神社的社傳等，亦有密切關連。如八十島祭、渡海祭儀、「大帶日壳」、「住吉三神」、「香椎宮緣起」等，<sup>74</sup>這些

<sup>74</sup> 參見水野佑，〈神功皇后論〉，頁 22-26；阪下圭八，〈神功皇后伝説の形成——八十島祭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文學》，37(東京，1969)，頁 59-62；米澤康，〈神功皇后傳説の一考察——その祭儀的基礎と發展〉，《神道史研究》，10：2(京都，1962)，頁 23-33。前田晴人認為，「大帶日壳」的神話比《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的「息長帶日壳」傳說更早。「大帶日壳」產生的基礎不是地方，而是宮廷。神話的起源，可上溯至六世紀。當《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編纂時，「大帶日壳」變成「息長帶日壳」。參見前田晴人，〈神功皇后伝説の誕生〉，頁 135-141。高階成章認為，九州地方很早就有大帶姬的信仰。參見高階成章，〈神功皇后紀の成立過程〉，頁 16-24。塚口義信認為，「大帶日壳命」的稱號在《古事記》和《日本

早已存在的傳承，均融入到皇后的傳說中。《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可以推測大約是半島問題、現實歷史、地方信仰三方面的結合。

元軍征日以後，神功皇后的傳說增加更多新內容，對皇后的記載增加更多神秘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將異國人形容成狀如鬼神，將新羅王視為「犬」。這種蔑視朝鮮的心理，部分源自日本中世的領域觀和神國觀，更直接的應是由於怨恨高麗協助蒙古入侵而產生的，此影響後世日本人的朝鮮觀。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在從軍武士、僧侶心中已有深刻印象，並有「三韓入貢是先例」的認識。而秀吉在出征時，參詣奉祀皇后的社祠，除期待皇后護持外，似亦在藉此以強化他用兵的正當性。至近世，由於儒學的發展，強調禮的秩序，一些日本思想家否定皇后的神怪傳說，認為視新羅為「犬」的傳說是附會，並將神功皇后的傳說大致回歸到《日本書紀》的記載，甚至試圖給予合理的、道德的再建構。此外，皇后的傳說，經由節慶、戲劇、信使行列記等，亦在近世社會大眾之間廣泛流傳。傳說的內容，則大致沿襲中世的模式。一些儒學者雖從道德角度重新解釋傳說，但對一般民眾沒有太大影響。

近現代日本積極對外擴張，朝鮮是其遂行大陸政策的首要目標，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便成為培養其國民帝國主義思想最好的教材。在國定教科書中特別編成一章，強調半島不穩定將立即影響日本。皇后誠意希望和平，出兵征韓是不得已。尤其將皇后出兵半島，視為是日韓合併的第一步，並以此作為解釋日本併吞朝鮮、日韓民族融合的理論依據。戰後，在盟軍總部的指令下，新教科書以科學、客

---

書紀》成立以前已存在，但並不意味比「息長帶日壳命」早。參見塚口義信，〈大帶日壳考——神功皇后伝説の史的分析〉，收入三品彰英編，《日本書紀研究》第5冊，頁193。

觀、合理的方式撰寫古代史，神話和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完全被排除。1956年以後，日本國內、國際環境均發生變化，尤其是日本國民的自覺，日本希望再重建自己的教育。但之後修訂的新教科書只恢復神話，並沒有神功皇后的傳說。

當日本要合理化其對外擴張野心時，常利用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強調古代半島國家對日本朝貢的事實，以此根植國民的信心。另外，中世皇后傳說新內容中的蔑視朝鮮觀，在近代日本處理對韓外交時，此心態並未改變。

(本文於 2007 年 7 月 3 日通過刊登)

##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Korea: The Legend of Empress Shenkung's Invasion of the Three Kingdoms of Korea

Li-hsin Lo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gend of Empress Shenkung's invasion of the Three Kingdoms of Korea—Hsinlo, Paichi, and Kaojiuli. Analysis is focused on the content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egend, how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Japanese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it as an educational material to influence the Japanese public, and as a means to observe how Japanese of different eras have viewed Korea. Many questions remain unresolved about the legend of Empress Shenkung's invasion of the Three Kingdoms of Korea. However, we can safely presume that the legend is rooted in a combination of Korea problems, historical reality, and local beliefs. New materials have been continually added to the legend since the twelfth century. Legend had it that the King of Hsinlo was once regarded by ancient Japanese as a dog. This attitude of contempt had a tremendous effect on the later perspectives of Japanese toward Korea.

In modern modern times expansionist Japanese governments consistently targeted Korea as the primary goal of continental polic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ried to justify its annex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Korea through public education and by adoption of the legend of Empress Shenkung into history textbook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legend was refu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disappeared from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But the legend of Empress Shenkung's invasion, rooted as it is in nation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cannot easily be relegated to oblivion.

**Keywords: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Korea, Empress Shenkung, Three Kingdoms of Korea (Hsinlo, Paichi, and Kaojiuli)**